

RICH AND
POOR

富国的贫穷

(德) 卡特琳·哈特曼◎著

李明瑶◎译

人民日报出版社

RICH AND POOR

富国的贫穷

(德)卡特琳·哈特曼◎著

李明瑶◎译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富国的贫穷 / (德) 哈特曼著; 李明瑶译.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5115-2901-5

I. ①富… II. ①哈… ②李… III. ①贫穷—研究—
德国 IV. ①F151.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8926号

书 名: 富国的贫穷

著 者: (德) 哈特曼著; 李明瑶译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袁兆英

封面设计: 三鼎甲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 (010) 65363105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新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237千字

印 张: 16.5

印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2901-5

定 价: 42.80元

目 录

第一章 文明的厌恶 / 001

为什么消费社会通过排斥性来保障它的持久？为什么中产阶级向下流动却向上看齐？

中产阶级的聚餐时间—消费社会中的贫穷—对“相对贫穷”的误解—社会寄生虫的传奇—对无用者的设计和穷人的犯罪—中产阶级的堕落—社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及其后果

第二章 “……让他们吃蛋糕好了！” / 023

剩余的东西给多余的人——食品银行的运转方式和功效

救济取代再分配—剩余的东西给多余的人—废物变食物—没有权利的顾客—富裕社会的垃圾：义务和非义务清除者—超市是食品浪费的受益者—膳食破坏和全球饥饿—贸易公司的道德战略—德国的饥饿性贫穷—食品银行以其创造的“经济奇迹”掩盖贫穷—食品银行和政治—谢绝批评—贫民救济厨房的最后出路—为什么经济精英提倡食品银行理念—关在门外的人被再度排斥—对穷人的处罚—感恩就是货币

第三章 从城市绅士化到封闭式社区 / 073

在城市中穷人如何被富人排挤，而政治又为何对此起着推动作用

小市民朋克的起义—生活方式的冲突—排挤的最后阶段：超级城市绅士化—以好住址对抗社会阶层降级—围墙后的世外桃源—在“问题地区”居住更好—当布景变得有生命力—将城市当作企业—法兰克福：来自采购天堂的驱逐

第四章 精英们的权力 / 103

为什么这些富人告别社会？他们如何为保障自己的利益而不遗余力

富人们为“他们的”高级中学而毫无顾忌的斗争—保护财产对抗平民—以中产阶级的恐惧作为武器—“造就精英”取代教育机会均等—以成就论英雄的神话—政治精英化—政治如何优待富人—通过政府批准的骗税致富—“捐赠誓言”：财富的慈善化

第五章 终于有人说话了 / 133

报纸副刊如何维护创办者的权利

编辑部里的中产阶级小孩—多米尼克·布鲁纳尔—慕尼黑索恩车站的勇士：一次大众传媒界的突然行动—审判和判决—高级中学学生和下层社会的怪物—零容忍战略

第六章 团结互助的终结 / 151

政治如何为了经济利益损害就业、压制百姓

二等劳工—社会福利商店—“穷人的乐园”？—“就业奇迹”的赢家—劳务派遣：现代奴隶交易—为经济增长过早牺牲—富翁的奴仆

第七章 世界援助的私有化 / 173

是社会化商业还是利用穷人赚钱

超级明星穆罕默德·尤努斯：市场经济的救世主——有良知的企业经济学家——受欢迎的国际企业达能——她们究竟去了哪里？——寻找达能女推销员——把糖给穷人吧——对抗贫穷的工业化食品——假借服务社会开拓市场——“商业慈善家”：阿迪达斯、巴斯夫和奥托——谢绝批评——社会化商业和小额信贷的德国版本：一人公司——未来的“社会化精英”

第八章 小额信贷：有计划的疯狂 / 217

来自孟加拉国的报道

社会排斥取代妇女力量——耻辱经济学——以扶贫的名义没收财产——童话村庄：乔布拉村和“希拉里村”——非政府组织充当资本的帮凶——私人债务作为发展援助——小额贷款造成的饥饿和童工劳动——饥肠辘辘地跌入债务陷阱——盲目的经济学——巨星的陨落——“贫民银行”的体系——小额信贷与气候变化——紧急救援用作还贷——从华尔街到铁皮屋——印度和孟加拉的自杀事件——劳动力市场的奴隶

第九章 把美好生活拿来 / 253

为什么只有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才能为公平的富裕而斗争？

彻底抛弃病态制度才是关键——绝望的愤怒

第一章 女性主义

“如果我们走进房间时没有人回头，如果我们说话时没有人应答，如果没有人察觉我们做了什么，如果我们被所有人忽视仿佛根本不存在，那时，愤怒和无力的绝望就会在我们心中升腾，与此相比，最难以忍受的身体之痛也仿佛是一种拯救。”

威廉·詹姆斯，美国心理学家，写于1890年

第一章 文明的厌恶

为什么消费社会通过排斥性来保障它的持久？为什么中产阶层向下流动却向上看齐？

企业主管办公层宽敞明亮的走廊，看上去像一间有时尚创意的LOFT，如同我们在时尚杂志里看到的那种。

靠墙白色的餐具柜上放着一台浓缩咖啡机，另一面贴着图案壁纸的墙前摆着浅色沙发，并搭配亮白色家具，休息厅和客厅的混搭风格。摄影师们装好器材，找好角度，很快，我在这儿的采访便开始了，访问对象是一家年销售额数十亿的跨国企业的女性新闻发言人。

采访在轻松随意的闲谈中开始，我讲了写这本书的创意，谈到在那些专门把超市剩余食品分发给穷人的食品银行^①我所做的调查。

① 食品银行，在德国叫做Tafel，其实和银行没有关系，而是一种公益组织，可以理解为捐赠食品店，主要目的是为基本生活有困难的人士提供膳食援助。超市把即将过期或过季但仍有用的食物捐赠出来，经过志愿者的分类处理，运送到各地的食品银行。目前在德国已有超过900家，欧洲许多国家以及美国都有类似的组织，通常笼统称之为Foodbank。（译者注）

“有意思。”新闻发言人回答道。

接着她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常常想，我们能做些什么？可以使大家学会珍惜食物。”

“是的，”我说道。同时想起了那些堆满整箱食物的超市货物装卸台，那些食品仅仅因为看起来卖相不够好就要被淘汰掉。在德国，每年有2000万吨食物要被扔掉——这是名副其实的丑闻。

然而，新闻发言人想的和我并不一样。

“我认为，我们应该让那些在食品银行领取食物的人必须做公益劳动。”新闻发言人口气强硬地说。

她的话，让我想起了那些针对少年犯的劳动改造！让这些没有捐赠的食物便无法过活、穷得走投无路的人做公益劳动？再说，大多数食品银行的受益者根本已经了解这些食品的价值，因为他们在超市里几乎买不起这些东西。为什么单亲父母、领养老金者、最低收入者还要为了填饱肚子去清扫大街和捡狗粪便？

对于我的质疑，新闻发言人是这样说的，“因为不付出劳动的话，他们就会轻易地把食物丢进垃圾桶。”

我曾和许许多多食品银行的常客交谈，陪他们回家，观察那些分类处理捐赠食品的志愿者，并且和他们一起去各个超市取货。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一个充满羞耻和痛苦的令人震惊的世界；认识了一些尽管每天面对屈辱，但为了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竭尽全力的人们，在这个社会，他们既得不到承认，也得不到尊重。

像新闻发言人那种想法，认为某个人为了剩余的食物而勉强自己去排队，仅仅是为了随后把它们丢掉的想法，简直荒唐。那么，像新闻发言人这样标准的中产阶级女性，不会出入被救济人群的圈子，何来这样的想法呢？她的回答是，从一位教师那儿听说的——来自“哈茨四家庭^①”的孩子

① 哈茨方案（Hartz-Konzept）是德国政府针对失业人口实施救济的社会福利方案。以方案制定小组负责人彼得·哈茨（Peter Hartz）的名字命名。从2003年1月实施Hartz I，之后不断修改，到2005年1月推出Hartz IV方案，即“哈茨四”。通过“哈茨四”长期失业人员可以领取最低限度的失业救助金，通常称为哈茨四救助金。靠这类救助金生活的家庭称为“哈茨四家庭”（Hartz-IV-Familie）。（译者注）

更愿意把披萨饼丢进垃圾桶，而不是分一小块给他们的同学。

有一次，我去市郊看朋友。那是个初夏的暖日，太阳能蓄电池在这栋新建的生态屋顶闪闪发亮，我们坐在阳台上，喝着加了有机牛奶的咖啡。房子的女主人是城市里的普通中学^①的见习教师，那是一所所谓的“问题中学”。

这位未来的教师对她的学生非常恼火。如果这些年轻人得不到工作，她是不能理解的。在她看来，餐饮业和酒店业几年来都在“急迫地”寻找培训生，“问题是他们根本就不想工作，这是他们自己的错。”

真的是这样吗？据食品饮料餐饮联合会（NGG）对实际情况的公开批评，2010年，想要接受职业培训的年轻人中，有三分之一得不到培训岗位；培训岗位的供应量下降到了十年来第三低的水平。而且，这之中有50%的工作岗位是月工资在450欧元以下的低收入工作。

由此看来，常常被人们说的劳动力短缺和所谓的培训岗位供过于求，纯属传说。

听了我的介绍，这位年轻的女主人固执地回应道：“学生们对我说，工作没劲，他们更愿意领哈茨四救助金。”是的，这是一种中学生惯用的挑衅，尤其那些对制度已经没有期待，而且也不允许再期待什么的学生来说。作为中产阶级的成员，教师距离无产者的日常生活非常遥远。他们也许每天都必须处理那些因歧视性社会福利政策而产生的后果，但对待这类政策的受害者们，始终存有偏见。

根据奥尔登堡大学2009年的一项研究，教师甚至可以通过名字辨认出学生之中行为独特和成绩不佳的：“凯文（Kevin）不是名字，而是一种诊断”，在针对教师对名字的偏好以及由此衍生的属性联想的调查中，一位女教师是这样说的。

① 这里指（五至九年级）的普通中学（Hauptschule），毕业后不参加高考而是进行职业培训。如果想上大学就要到高级中学（Gymnasium）或者综合型学校（Gesamtschule）。（译者注）

中产阶级的聚餐时间

晚餐时，一群中产阶级人士在饭店小聚，在座不是记者就是学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谈话投机，一如既往，大家都是同一阶层的人，对很多事物的看法是一致的。其中一位突然说道：“哈茨四救济金受领者只去食品银行，是为了能给自己买最新款的苹果手机。”

显然，他这样说，不过是为了表现自己，并没有挑衅的意思。在座的无人反驳，也无人对此令人愤怒的诋毁感到反感，还有一人点头附和。

怎么会这样？

在座的每一位都有份不错的工作，工作中他们获得满足也得到认可，有些人的收入甚至高于平均水平。每一位都受过高等教育，对政治和文化充满兴趣，平日至少读一份跨地区的日报。其中某些人早先也许是左翼人士（而今他们会说，他们已经变得“现实”了），必须承认，在一些基本的道德问题上，大家是有一致认同的。如果有人发表针对另一族群的歧视性言论，类似“外国人夺走了我们的工作岗位”或“黑人都是毒贩”，那么在座的这些中产阶级，多半如鱼鲠在喉，谈话气氛瞬间凝结。

然而，就哈茨四受领者只去食品银行是为了给自己买苹果手机这个问题上，在座的记者却表示赞同。另一个人还说：“是，他们总是有新款的手机。除此之外，他们去食品银行时，总是穿得很好。”

一个人继续补充说：“我听说，自从取暖费报销以来，他们疯了似的烧暖气。”估计是听蒂洛·萨拉辛说的：“哈茨四救济金受领者在家的时间更多，其次，他们喜欢把暖气开得很热，另外很多人用窗户调节温度。”

人们不禁要问，谁会只为压榨政府而当真把暖气烧得过热？事实上，哈茨四救济金受领者和其他贫民，大多居住在偏远的社会福利房。取暖费的报销额度由地方政府负责做决定，政府规定，多大的居住面积花费多少取暖费是“合适的”。而一旦超出报销额度，就得自己支付，这对于贫民意味着挨冻或搬家。电、天然气和热水的使用已包含在补助标准中。如果实

际使用超出标准额度，比如有可能因为能源价格上涨，超出的费用，哈茨四受领者仍就必须自掏腰包。这意味着关灯、关灶、洗冷水澡和欠债，为了支付电费账单，有些人甚至得挨饿。

在德国，贫民忍受着能源贫困之苦。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环保精英以补贴的形式，得到安装在自家房顶上的太阳能蓄电池，从而节省天然气和电的使用，如果把它们输入电网，还可以赚到钱。人们应该了解这些事实。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不禁问：“你们从哪里得到的这些信息？你们认识这样的人吗？”

“是的，当然”，在座其中两位立刻答道，“我们可是生活在柏林的。”

这倒是件值得注意的事。无论如何我确实得寻找一些所谓的“下层人士”，和他们谈谈。找到他们，要去食品银行以及城市边缘的慈善商店。

在德国，各个社会阶层彼此疏离，几乎没有什么交集，也没有一个能使来自不同阶层的人遇见和交流的地方。反正工作场合是办不到的，因为长期失业者已经被职场拒之门外了。他们的“工作场所”是职业介绍中心，而他们的任务似乎就是将全部生活开放，给国家查阅以便调节安排就业，写无数次求职申请以及忍受压制。在日常消费生活中，彼此是不会碰面的，因为新贫民是靠另一个世界而生活的，那是一个在综合书店、葡萄酒专卖店、时装店、周集市、有机食品商店以及时尚购物中心之外的平行世界。很多贫民靠慈善商店、衣物回收店或者食品银行的食物分发站养活自己。他们并不生活在同一个城区，因为考虑增值效益的城市政策旨在使穷人离开他们所熟悉的环境而搬到价值相对较低的区域，即“问题地区”，在那里没有任何人会迷失。当劳工局不再负担最便宜的市中心住房的房租，理由是那么低的房租好像“不合适”，这个时候想不搬家也不行了。如果他们真的还有朋友和熟人，他们将会竭尽全力隐瞒自己变穷的现实——如今贫穷不再是令人同情的状况，不会有人四处兜售。他们不会出现在健身房、剧场、音乐厅、电影院或酒吧和饭店——每月364欧元根本就没有参与文化和社会活动的可能。因而，很多穷人是过着隐居生活的。

当一个人跟不上社会，成了落伍的人，当他不再闲侃新书和电影；当他对社交圈不再有任何有趣的贡献，讲不出任何自己生活里的新鲜事，因为日复一日的单调和苦恼；当他觉察老朋友对待自己如同躲避传染病似的；当他发觉周遭的人认为，变穷是他自己的错，当这一切发生了，他将迅速失去和这个社会的交集。

哈茨四不仅造成贫穷，而且导致失语。主要是，大声表达成见的人是新闻发言人、记者、教师那样的意见领袖。他们的愤怒，不是表达对在一个富裕国家里仍有人要靠食品捐助为生这一现实的不满，而是针对这些受捐人拥有手机，以及在冬天烧暖气的现象愤愤不平，这种态度说明了，中产阶级对穷人的排斥，以及中产阶级对比穷人，彰显自身优越感。

消费社会中的贫穷

手机，很说明问题。它不是一件简单得像饭勺那样的日用品。移动电话承载着象征意义：通过它，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和任何人交流，可以随时拍摄并通过互联网实现视频，用一个关键词形容——互联网时代来临，而且它还代表着自由地讲话，代表言论自由和民主。

近90%的德国人使用手机，平均每一个德国人拥有1.3份手机合约。但是，只有20%的德国人认为，手机对于哈茨四救济金受领者是属于基本需求。

剥夺穷人使用手机的权利无异于：你们再不能发表意见，你们再不属于这里。遗憾，你们得在门外等着。

“在信息时代，隐形或多或少意味着死亡，”澳洲文学教授吉曼·基尔如是说。

在一个拥有隐蔽的等级制的社会，归属感是通过地位象征符号来表现的。手机始终是参与社会的象征，也是体现差别的神器。早期，装在大箱子里的移动电话代表着情报机关、政客和警察，即权威机构的特权。此后，富人让自己享受到了车载电话的奢侈，它当时的技术设备，填满了他们运动型轿车的后备箱，以至于几乎装不下高尔夫球袋。通过苹果手机，一群所谓

“文化创意”人士得以实现身份认同；黑莓手机曾经是商界老板和证券经纪人的标志。恰恰是通过黑莓手机，英国青少年曾约定了他们的一系列抢劫活动^①。一群无用之人利用看起来不可或缺的技术，得以“实现”他们自信应有的权利——具有强烈象征作用的景象。同样的，至少报纸专栏很快注意到，那些掌握经济权力的人，是怎样以合法方式肆意用我们的钱，他们买液晶电视和品牌运动鞋这样的消费品，也是权力象征物。如此看来，英国首相卡梅隆的做法倒也合乎逻辑，他不仅用削减社会救济，以及把他们赶出社会福利房来威胁闹事者，而且还考虑对这部分人关闭公共媒体和黑莓服务。

“穷人被推入这样的境地，要么把其少量的钱和有限的可支配资源花在一些无意义的消费品而非生活必需品上，以避免绝对的社会降级，要么准备接受讥讽和嘲笑。”南达·莎瑞斯特拉如此描述穷人在全球化消费社会中绝望的归属努力。

在像德国这样的富裕国家里，穷人同样被轻视。当他们为了领取超市捐赠的食物排队时，他们至少穿上体面的衣服，这是他们保持尊严的方式，而即便如此也会遭到责怪。在德国，难道穷人得先有饿瘪的肚皮，才相信他们的贫困？穷人为了得到我们的同情，非得衣衫褴褛？还是我们对贫穷有着错误的想象？

对“相对贫穷”的误解

贫困研究者克里斯托夫·布特威格，在其著作《一个富国的贫穷——贫穷问题如何被轻视和排斥》^②中这样写道：“我们对于贫穷的想象，是由大众传媒所宣传的发展中国家的绝对贫穷和困苦而塑造的”。“人们错误地

① 2011年8月6日在伦敦开始的一系列社会骚乱，起因是2011年8月4日在伦敦北部的托特纳姆，一名29岁的黑人男性平民Mark Duggan被伦敦警察怀疑非法持有枪械而枪杀，民众上街抗议警察暴行。骚乱蔓延到其它城市，参与骚乱的年轻人通过黑莓Blackberry Message组织和协调袭击活动。（译者注）

② Christoph Butterwegge: Armut in einem reichen Land. Wie das Problem verharmlost und verdrängt wird.

认为，贫穷问题在卡门茨、卡尔斯鲁厄或者卡塞尔^①，没有在加尔各答、开普敦或卡拉奇那样棘手，所以不值得谈论。”换言之，人们认为贫穷问题在德国并不严重。本来嘛，“这里并没有显现出惊人的贫困”。

事实上，贫穷这个概念并没有被清楚定义。“贫穷是一个多义、含混，承载道德和情感属性的术语。”贫穷取决于其存在的社会环境。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可通过数字来理解。

“绝对贫穷”这个说法，用来定义缺乏生存必需品，如食物、衣服、住所和医疗保障。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每人每日少于1.5美元可支配花费，即属于绝对贫困。全世界范围内有12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据世界卫生组织和经合组织的标准，月可支配收入低于其所在国国民中等收入一半的人，属于相对贫穷。在德国，联邦统计局2009年算出，每月的等值化家庭所支配所得共计每人1549欧元，只达到这个数字60%的人，按欧盟的定义，已在贫困线边缘；只达到40%的人，即拥有月可支配收入619.53欧元，属于相对贫困。上世纪九十年代德国贫困人口占11.3%，而今已达14.5%。

据估算，在德国约有20万至80万人涉及相对贫穷。1150万德国人，即七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边缘或低于贫困线。在德国，多数穷人是失业者，超过贫困人口的一半，即670万人领取哈茨四救济金。

相对贫穷，听上去无伤大雅。仿佛德国穷人并非真穷，而只是不富，尤其相对世界其他地方饿死在大街上的人而言。俗话说：保时捷可能没有，但德国没人挨饿。我们在这儿过得还不错！也正因为如此，穷人在富裕国家多被冷漠对待，通常遭受的是厌弃和轻视。

“所有在物质富裕国家生活的人衣食无忧，每个人都有栖身之所。同样，所有人都享有教育、医疗和文化服务。就贫困这个词的根本含义而言，无人承受其苦，”新保守主义社会学家迈因哈德·米格尔下此断言。

此言差矣。米格尔还认为，如果把在德国生活的人视作贫穷，“则是对数亿的真正贫苦人民的讽刺性轻视，他们缺失的不仅是社会地位，而是基

① 德国城市。（译者注）

本的生存必需品。”毕竟哈茨四救济金受领者可能达到了某种生活标准，它高于甚至部分远远高于当今世界四分之三人口的生活水准，或者好于那些活在类似上世纪五十年代德国生活水准的国家的人。另一方面，这又是对富裕国家穷人的生活现实的讽刺性忽视：我们当然不能拿德国长期失业者的贫穷，和埃塞俄比亚的饥饿难民的贫苦相比较，毕竟他们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

相对贫穷不等于相对非洲，而是与社会环境相联系的。贫穷在德国的严重性并非仅仅由物质不足引起，还在于缺乏参与和承认。因此消费社会中的贫穷可能比穷国的贫穷更令人沮丧。

毫无疑问，战后，德国曾有一大批极度贫穷的人，很多人几乎一无所有，那时的贫穷并不是社会污名，没有人需要为此自我辩解。我在为写此书而做的调查之旅中，亲见的孟加拉的贫穷，可谓触目惊心，令人深感悲痛，然而那里的人不会因贫穷而受人指责。他们既不孤独也不沉默，很多穷人走上街头表达他们的不满。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富裕国家，穷人无权表达个人痛苦。人们甚至遮住他们的贫穷。

因此，在德国，贫穷是衡量日趋严重的社会悬殊性的标尺。凡事皆有两面，没有富裕也很难想象贫穷。在德国，人们越穷，财富本身就越会关注到自身的流失。宏观经济与经济状况研究所（IMK）发现，2000年至2006年，濒临贫困的社会阶层占德国总人口的比例，从18.9%增长到25.4%，同时，高收入阶层所占比例，从18.8%升至20.5%。

当我和那位女性新闻发言人告别时，她说，她曾亲自体验过哈茨四。我心生疑问感到吃惊，在我看来，哈茨四受领者晋升为企业发言人是件不可能的事。根据劳工局2007年的一项调查，在1000名哈茨四受领者中，只有34人能够得到一个有社保的工作岗位。那么，如何才能够“体验”哈茨四呢？女性新闻发言人说，在大斋节^①期间，她参加了一个福音派州基督教会

① 大斋节（或大斋期；天主教称四旬节），是天主教和基督教教会年历一个节期。整个节期从大斋首日（圣灰星期三）开始至复活节前日止，一共四十天。（译者注）